

祁龙威 著

祁龙威学术论文选

乾隆年间，惠栋继起，创造反对宋明“心即是理”的经方法论，反对“凿空”。

学苑出版社

代经师的

拈以明经文的义理。《九经古义述首》说：“汉人通经

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

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

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

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

也。”栋著《易汉学》、《周易述》，倡导恢复佚失的经

汉诂。其徒江声、余萧客等赞之，惠氏汉学于焉兴起。

栋旨在“求古”，其读经方法论具有二重性：优点是，

持传承汉代经师的训诂，反对宋学“凿空”说经；缺

是，不事创新，“株守”汉儒经说，不取其精华而弃其

粕。戴震稍后起，他继承并改进了惠氏的读经方法

从“求古”到“求是”。他也深嫉宋学“凿空”说经，

主张必由训诂以明义理，坚持对汉学的传承；但又谓

儒也有附会，不能“株守”错误的汉诂，敢于创新。

见于所撰《古经解诂序》等文章中。在戴学正确方

论的指引下，传承与创新相结合，一代朴学到了鼎盛

段。“扬州学派”便是此时戴学“求是”方法论孕育的

儿。王念孙得戴学真传，深明戴氏经术，他把戴氏治

之法，传承与创新相结合，施之于台、刘、古、无、文、

文虚造而违古义”；又反对“墨守”

祁龙威学术论文选

祁龙威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祁龙威学术论文选 / 祁龙威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077-4307-4

I. ①祁… II. ①祁…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②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9035 号

出 版 人: 孟 白

责任编辑: 刘 丰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787×1092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祁龙威学术论文选》自序

行年九十，选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所为学术论文，厘为一集，出版与同好交流，刊目以见大略：

《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

《乾嘉史学初探》(原载《江海学刊》1962年第1期)

《帝党与戊戌变法》(原载《新建设》1963年第9期)

《论清末的铁路风潮》(原载《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

《〈磷血丛钞〉辨伪》(原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原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考证学与历史研究》(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修纂〈清史·朴学志〉日记》(原载《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章太炎大传〉序》(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章太炎大传》)

《为太平天国史学鞠躬尽瘁——敬书〈罗尔纲全集〉后》(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读清代“乾嘉学派”著作一得》(原载《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9辑)

学识浅陋，各文都有缺失，未知追改，以存原貌，待方家正之。

2012年12月祁龙威谨记

目 录

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	1
乾嘉史学初探·····	13
帝党与戊戌变法·····	27
论清末的铁路风潮·····	42
《磷血丛钞》辨伪 ·····	79
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	97
考证学与历史研究·····	108
修纂《清史·朴学志》日记·····	125
《章太炎大传》序 ·····	172
为太平天国史学鞠躬尽瘁·····	175
读清代乾嘉“扬州学派”著作一得·····	190

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 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

解放以来，很多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们，几乎都把常熟的《报恩牌坊碑序》当作是说明在李秀成领导下，常熟等地太平天国政府政策的进步性和年丰人乐的根据。

我生长常熟，听到过关于太平军的很多传说，近年阅读史料，曾对这个残碑摩挲勘订，发现它的内容与历史的真相不符。

一、关于“报恩牌坊”的来历问题

《报恩牌坊碑序》并不如有些同志所理想的是“常熟人民感恩报德”的文章，^①而是以钱桂仁为首的一群叛徒别有用心地谀颂忠王的作品。

原来太平军在攻下江南前，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庞杂而不稳定的队伍。其中久经艰苦战斗、忠贞于农民革命事业的广西老战士已经很少，“大抵以湘、鄂、皖、赣等籍人，先充官军，或流氓地痞，裹附于贼，或战败而降贼军，积赘得为老兄弟者居多”。^②在攻下江南的时候，大量的招降纳叛，^③更加深了自己内部的危机。有不少地方政权，已落在一些堕落分子的掌握。

常熟昭文守将钱桂仁，桐城人，他和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④当咸丰十年（一八六〇）秋季，接防常昭之后，即表现出种种背叛革命的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 57 页。

② 李圭：《思痛记》卷上，《太平天国》第 4 册，第 480 页。

③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第 121 页，中华书局 1954 年 6 月版。

④ 李鸿章：《朋僚函稿》第 2，同治元年闰月二十七日《上曾相》。

行为：

生活腐化，贪污享乐

龚又村《镜稚轩自怡日记》^①说：

（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五日）晚见钱伪帅查卡，……至存仁堂，爱大船厅，命师帅拆移城馆，扎本松桧两盆，亦随身去（卷20）。

他在同年八月八日写道：

其盐务则拨各乡，著军师帅销卖，……（每斤）钱帅归四文（同上）。

以后他的部将骆国忠乘钱桂仁到苏州的机会，争先发动叛变，觊觎他的“贵重”，^②也是原因之一。

重用地主分子

钱桂仁在常昭，任用陈耕云为军政司，“专管粮务”。陈系寓居在常昭的仪征县廪生。有人亲见他“豪华特甚，时有姬人艳妆出屏见客，每图要办米八百石，银一千五百两，……米色顶真，须出使费，乃斛收”。当时在钱桂仁部下，陈的权力最大。其次为胡伯和（一名昌奎），“系徽州人，丙午孝廉，江苏拣发知县，被掳掌吏科”。这个反革命的两面派分子一心效忠清朝，在病死之后，他的木主上还写着清朝的官衔。通过胡伯和的关系，原来躲避在农村的南乡大地主曹和卿便公然进城，面见钱桂仁，不论关于“收漕”、“试士”等大政，钱桂仁、胡伯和都向他请教。准许地主收租和考试“出四书题”，都是他的主意。博得地主们齐声喝彩，说他

①《镜稚轩自怡日记》系未刊之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参阅1957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史学》第101号，拙作《介绍镜稚轩自怡日记》）。

②谭嘘云：《常熟记变始末》卷下，《太平天国》第5册，第403页。

能够“片言使狂寇回心”。^①

支持地主，剥削农民

太平军初到常昭，是不准地主收租的。经过地主分子的活动，钱桂仁便公然支持他们剥削农民。《镜稚轩自怡日记》说：

辛酉二月，邑绅曹和卿具稟钱伪将：悯城士流落于各乡者
度日艰难，每亩酌收三斗，立租局于吴塔左近（卷21）。

这样，便激起了常熟南乡农民的强烈反抗，很多租局的房屋被拆毁，“局董”被击毙，钱桂仁竟派兵镇压，并亲自下乡，“访获周姓二人，熬审毁局，随带回城”。同年秋收的时候，钱桂仁更进一步地支持地主收租。

（八月八日）闻伪示：业户呈田数给凭，方准收租，每亩出田凭费六十，又欲呈田契铃印，图取税银，曹和卿劝止，现设公局于西庄存仁堂，议各乡租米，归局代收（同上书卷20）。

（十月初五日）见武军政洪（原缺）示十款：如佃农匿田抗租，……本人处斩，田亩充公（同上）。

（十二月望日）迎天豫钱（原缺两字），下洞港朱局，……谕司马百长，飭佃农五日中完清租粮，即桂仁之子也（同上）。

私通敌人，阴谋叛变

当太平军攻下江南时，这里的封建残余势力被迫向三方面退却，一部分逃往上海；一部分钻进太平军内部；一部分潜伏农村。不久，他们又迅速地重行结合，以上海为基地，利用农村中的据点和力量，通过钻进革命内部的人，勾诱动摇分子，梦想内应外合一举攻陷苏福省。

据很多史料记载，钱桂仁很早就和苏州守将熊万荃、降将李文炳以及盘踞在苏、锡、昆、虞四县边区的地主武装首领徐佩璠等勾结，接受流亡在上海的苏州知府吴云的指挥，进行叛变活动。吴云于一八六一年致李

^① 以上均见《镜稚轩自怡日记》。

文炳的密信里曾说：

金二戈处既已扣定，有无生法之处？^①

同年，江苏巡抚薛焕奏报清朝：

常熟贼目钱安邦……欲乘间投诚，束身归罪。^②

有个参与叛变阴谋的周庄大地主写道：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接吴藩司密札饬费秀元（即费玉成，盘踞周庄的土匪头目）整备船勇，堵御葑娄一带援贼，盖因苏城贼首李文炳、熊万荃、钱得胜与永昌团董徐少蘧佩璠同谋内应，据称有兵六万，不用官军援剿，但请上海设局以济其饷，于是府尊吴平斋云至泖塔，倩清卿（吴大澂）来镇候信，振甫亦自长渠至，将密调孙少襄（孙金彪，盘踞盛泽的土匪头目）之众为外应，不意忠逆于十七日率群贼自杭回苏，内外悚然，俱不敢动，然糜饷已十余万矣。^③

在大叛变流产之后，钱桂仁的投降活动更加积极。李鸿章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闰八月二十七日，写信给曾国藩说：

常昭踞逆钱百顺桐城人，密托程学启乞降，所部二万，存饷二十万，可支数月，俟嘉定克复，我军进昆山，便以城来归。^④

① 吴云：《两垒轩尺牍》，卷12，《复李某》。“金二戈”系钱字的暗号。

② 《同治东华续录》，卷1，咸丰十一年八月丁巳《上谕》。

③ 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卷上。据《镜稚轩自怡日记》，钱桂仁一名得胜。

④ 李鸿章：《朋僚函稿》第2，同治元年闰月二十七日《上曾相》。

谭嘘云《守虞日记》:

桂仁素有反正之心，因无援未发。会李抚军收浦东降众，连克青浦、嘉定，军威大振，桂仁遣董政勤至彭家桥海口，阳为负固之计，阴图纳款之谋；政勤曾隶行伍，于官军有旧也。^①

同年十一月，这个叛徒完成了叛变准备之后，便阴狠地企图谋杀忠王。庞鸿文《常昭合志稿》说：

桂仁先于虞山门外筑石营，工竣后即赴苏将诱伪忠王李秀成至常昭阅城计杀之。^②

不料骆国忠争先发动叛变，杀掉了他的全家，夺取了他的资财。钱贼一时进退失据，后蒙忠王宽大，令其将功赎罪，但是在左宗棠进攻杭州的时候，仍“遣人纳款献城”，最后，可耻地“跪伏道旁，泣求免死”，留下了他的狗命。^③

总之，从钱桂仁的身上，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和太平军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体现出农民战争失败的共同规律：即太平天国革命和历史上所有的农民战争一样，它能够消灭外部的敌人，而无法纯洁自己的内部；它能够在军事上战败地主阶级，而抵抗不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侵袭。内部的反动势力和堕落倾向随着战争的胜利而不断滋长起来，特别是在进入“财赋之区”，被子女玉帛所包围的时候，便给敌人以内外夹攻的机会。

狡猾的叛徒们，为了隐蔽叛变的逆谋，千方百计地媚惑革命的领导者。《镜稚轩自怡日记》曾说：钱桂仁在常熟城内前造桥筑花墅，“为伪忠王行宫，水木工疲于奔命”。当一八六二年初，大叛变流产之后，他一方面更积极地准备叛变，另一方面加紧对忠王献媚，《报恩牌坊碑序》就是

①《太平天国》第5册，第407页。

②《常昭合志稿》卷18，《兵制》附《兵事》。

③《左恪靖伯奏稿》卷14，《陈明钱贵仁事前通款贷其一死片》。

这时的产物。^①所以《海虞贼乱志》说：

闻伪忠王奉召回京，遂于南门外建一大石坊，名报恩忠王坊，盖以忠王为伪天王檄召，特建此坊，谓忠王爱民如子，民不能忘，王虽去京，此坊如召伯甘棠之意。忠王大喜，加钱逆为受天天军主将，独掌常昭军民事务。^②

撇开地主阶级对革命污蔑的意义，这段记载是含有某些真相的。又据《镜稚轩自怡日记》说，叛徒们还借着建筑牌坊的名义，大肆搜括，“佃农疲惫不堪”，成为严重的灾难。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天真地把这个残碑当作是人民感恩报德而营造的，那就完全违反了历史的事实，而被叛徒们所窃笑了。

二、关于碑文内容的真实性问题

在叛徒们的横征暴敛之下，常、昭两县农民的生活到了困苦不堪的境地。

据各种文献所记，当时常、昭农民对政府的负担是异常繁重的，有公粮、军租、田凭费、上下忙银、兵饷捐、红粉捐、过路供应费、免冲钱、筑海塘捐、修塘路捐等种种捐税名目。再加上各级官吏的层层剥削，又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请看一八六一年秋收时，常熟南乡佃农应缴的每亩租粮总数：

公粮——三斗三升；加费钱一百十四；

局费——一斗；

① 陆筠：《海角续编》谓《报恩牌坊》建成于同治元年二月，顾汝钰《海虞贼乱志》则记在同年六月后。罗尔纲先生推测为前者所记是建坊开始的时候，而后者所记却是牌坊已建成的时候（《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58页）。按《镜稚轩自怡日记》说“（同治元年三月初九日）舣舟至城，……见报恩坊新造，在丰乐桥境”与《海角续编》之说合，《海虞贼乱志》系追记之词。

② 《太平天国》第5册，第374页。

田凭费——一斗；
委员监局费——一斗；
地租——一斗。

叛徒们的搜括手段又是极端残酷的。“一有不应，已链条加颈，甚则杖枷。”^①以下是《海虞贼乱志》记同治元年春夏间常昭东乡的情形。

拘农民具限期，每亩赋役折价，涨价至二千零六十文，农力何能完办？到麦熟，有未清者，伪职代坐天父堂，着司马伍长交出欠户，当堂行杖，命听差随至其家，将所收麦子蚕豆尽行拿出作价抵偿。老幼男女见此情状，泣泪如雨。^②

主要由于叛徒们的这样搜括，造成物价飞涨，更加深了农民的灾难。原来每斤十八文的盐价，经过钱桂仁等层层抽税，增加到二十八文。^③就在“报恩牌坊”建成后不久，《镜稚轩自怡日记》说道：

（五月初十）见天久不雨，例破黄梅，农夫望云益甚，致米珠粟玉，度日大难而追呼仍如火急。予寓买米每石价至六千五百，乃未几而增至八九千，谁能堪此（卷21）。

同年有个常熟地主周鉴在《汝南一家言》中写道：

去夏米价六千，今夏贵至八千以外。道光二十九年大水，米价五千八百，咸丰六年大旱，米价六千，皆无如此之数也。^④

① 以上据《镜稚轩自怡日记》。按当时因捐税繁重，所以叛徒们不得不限制地主的剥削，仅许收租一斗，以缓和农民的反抗。

② 《太平天国》第5册，第373页。

③ 以上据《镜稚轩自怡日记》。按当时因捐税繁重，所以叛徒们不得不限制地主的剥削，仅许收租一斗，以缓和农民的反抗。

④ 《近代史资料》杂志1955年第3期。

叛徒们“三里五里设卡抽厘”，而且“店有店凭，数千至百数十千，逐日再加，抽日头钱，虽素菜摊日收四五文亦不免”。^①这样，就造成了“货殖亦难得利，闭歇者多”^②的商业萧条现象。

随着社会经济破产而来的，便是农民暴动。据各种文献的记载，在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和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两年间，常熟昭文四乡农民的抗租、抗粮、抗捐暴动不下数十次。

咸丰十一年四月，南乡吴塔、莘庄等地发生农民抗租暴动。

同月，南乡翁庄、樊庄等地和东乡的白茆都发生农民抗捐暴动。

五月，东乡陆家市等地发生农民反抗“军租”暴动。

六月，南乡四万荡，东乡陈唐坝都发生农民抗捐暴动。

十月，东乡的周巷桥发生农民抗粮暴动。西乡顾山发生农民反对查田暴动。

十一月，北乡福山、东乡柴角等处都发生农民抗粮暴动。

同治元年上半年的民变也多如蜂起。就在“报恩牌坊”建成的同月，西乡的小市桥还爆发了一次农民抗粮暴动。

这些暴动都遭遇叛徒们的血腥镇压，往往“大打先锋”，“民宅都空”，“俱成焦土”。

沿江一带的村镇，还不时遭受外国侵略者船舰和清朝“水师”的炮轰和抢劫。许多地主、土匪的武装也横行无忌。大局的恶化，更促成社会秩序的动荡。^③

试看这种情形，和碑文所说的，“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米之船”的民物殷阜景象正成尖锐的对比，有什么相似之处呢？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报恩牌坊碑序》当作描绘太平天国历史的根据，把叛徒统治下的混乱世界粉饰成为年丰人乐的理想社会，便不自觉地

①《近代史资料》杂志1955年第3期。

②《镜稚轩自怡日记》卷20。

③以上参据《镜稚轩自怡日记》、佚名《庚申避难记》（一名《庚申避难日记》，未刊本，系常熟西北乡黄家桥的一个小地主所作。土改后我于离黄家桥不远的港口镇发现，内容极富）、《海虞贼乱志》等书。

陷入了主观唯心论的泥潭。

三、目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

解放以来，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们都积极发扬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有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产生一种偏向，就是有些同志对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作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作“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这样，也就在自己和读者的面前筑起了一道隔离历史真相的高墙。《报恩牌坊碑序》的问题就是显著的一例。

迄今研究太平天国史最有贡献的是罗尔纲先生，从罗先生所写的书里，我们可以举出不少同样的事例。

按佚名《庚申避难记》说：

（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有长毛告示，要收钱粮，谕各业户各粮户，不论庙田、公田、学田等俱要造册收租完粮。

佚名《平贼纪略》记咸丰十一年正月无锡、金匮事说：

城贼黄和锦出示招募锡金老书吏，设伪钱粮局于东门亭子桥唐宅，分业田收租完粮。令民自行投柜，随给伪串。城乡业田者俱得收租糊口，或顽佃抗租，诉贼押追。^①

这些都是后期太平天国的部分地方的变节政府于咸丰十年冬季和十一年春季已经准许地主收租的证据。罗先生掌握了这些尚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并没有很好地用以说明后期太平军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他在《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一文里，为了证成太平军曾在苏

①《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188页。奚镇《锡金续识小录》卷1，有同样的记载。

常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论点，尽管在很多处征引这两种钞本，但是从来没有一提及上述两段记载，而是割取了另外几节片段的文字来描绘太平军在常熟无锡于咸丰十一年冬季还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设施。

《庚申避难记》一再说明太平天国常熟昭文政府从咸丰十年冬季以后就准许地主收租，而罗先生却固执地引用它的以下一段话来证明太平天国常昭政府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还保护佃农的土地所有权。^①

长毛又要耕种自田领凭，每亩米五升，折钱一百二十五文，
着旅帅必要催领。

姑不论罗先生置前文于不顾，就按这段原文也是说常昭太平天国政府在向佃农征税之后，又向自耕农征税，要他们领凭，并不如罗先生所解释的，是发给佃农“土地证”的意思。罗先生固然不了解常熟的方言，“耕种自田”系指自耕农而不是佃农；也没有注意到如果真的是满足了佃农的土地要求的话，那么，应该受到他们的拥护与欢迎，像《庚癸纪略》所记“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的吴江情形一样，为什么还要“着旅帅必要催领”，强迫农民执行呢？

《平贼纪略》于咸丰十一年十月有以下的一段记载。

伪乡官随田派捐以供贼支。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产，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可想，惟乡业熟悉田佃者或可每石收一、二斗不等。旋为贼知偏枯，是年春遂招书吏循旧章按户完粮收租。于是城业议设总仓厅于四城门外以便各佃户就近还租，公举薛某总董其事，出传单招各业主将租册送总仓厅者代完粮收租。因照足额，以至各佃户聚众拆毁而废。后归各业自行到乡收租，大抵半租而已。^②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09页。

② 《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188—189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刻地看出当时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性和嗅到太平天国革命行将失败的气息。但是在《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一文里，罗先生只摘引了“伪乡官随田派捐以供贼支。各佃户认真租田当自产，故不输租，各业户亦无法可想”几句，来描绘太平军在苏常地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经过。^①直到当时那个“总仓厅”董事薛某的“布告”出现之后，罗先生在笺释这个“布告”的时候，才不得不征引了上述《平贼纪略》的一段全文。^②不容讳言，罗先生这样地处理尚未刊行的史料，不仅损害了自己学术的成果，而且贻误了后学。

也由于罗先生这样地富于主观主义精神，所以有牵强附会的错误。例如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里，曾征引沈梓《避寇日记》来表明忠王在苏州的治绩：

过钱吟樵，言苏属乡镇未延烽火者十之七八，且迁徙者多，人烟转盛，城市富民往来贸易，货财充斥，增设市廛，贼但抽租增税而已，初不知其为乱世也，彼常以事至荡口镇，目见其然也。^③

实际上这是战时某些地方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与忠王的治绩无关。

按太平天国在苏浙建立政权，一般都是从城市到乡村的，所以当苏州、无锡等城市已经被太平军所占领，而不少地主豪绅仍据守农村对抗革命。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一部分土崩瓦解；一部分表面归附太平军，以保全地盘和实力。在他们的盘踞下，当时有不少未经战争和不受太平天国直接管理而被流亡地主当作安乐窝的巨镇，如华翼纶霸占的荡口、徐佩瑗霸占的黄埭、费玉成霸占的周庄、孙金彪霸占的盛泽等，这里的商业都畸形发展起来。^④另外有些没有受战争影响的商业中心地点，也呈现特殊繁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第209页。

② 《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188—189页。

③ 《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第129页。

④ 以上参据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潘钟瑞《苏台麋鹿记》、《贞丰里庚申见闻录》、《镜稚轩自怡日记》、仲虎腾《盛湖志补》等书。

荣的景象。《镜稚轩自怡日记》于咸丰十一年春夏之交说：

近因各路梗塞，办货者择地，东则往上海，南则往余杭，北则往通州，以及嘉定之黄渡、南翔，金匱之东亭、荡口，长洲之陆墓、黄埭，吾邑之野塘、彭桥（卷20）。

至于军队经常过往的地方，“若山塘、金顶桥数处，则浮摊不成市，时发时收”。罗先生没有引用《避寇日记》的材料来研究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复杂情况所造成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的社会现象，而牵强附会，夸大忠王个人的作用，这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是没有益处的。

总之，从《报恩牌坊碑序》和上述其他事例，说明了过去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一种偏向，就是主观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所造成的偏向，它阻碍了我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做更深刻的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克服这种偏向，才能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一步。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